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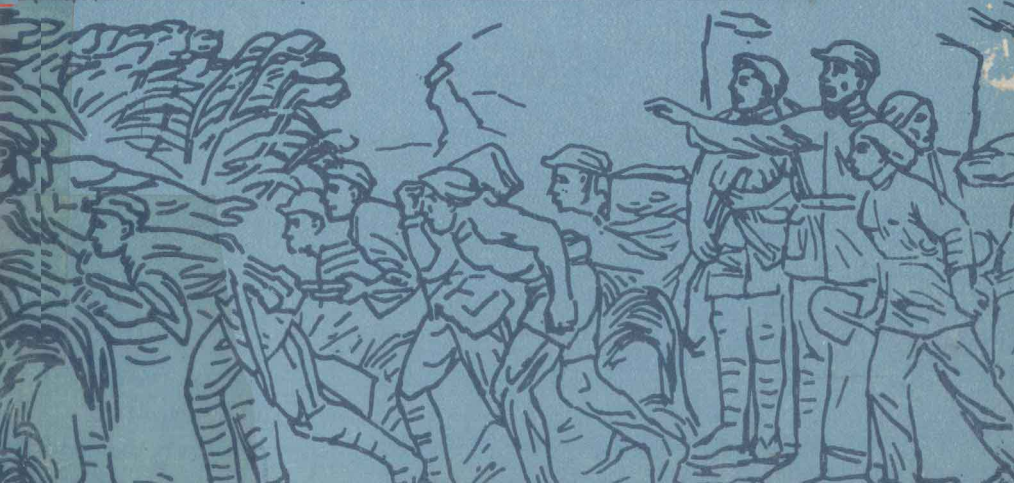


3

1985

近代史 研究

JIN DAI SHI YAN JIU



1979年10月创刊

1985年

近代史研究

3

(双月刊)

总第27期 5月出版

·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 (一) ·

开展河北的游击战争.....徐向前(1)

抗日战争时期的苏中根据地.....管文蔚(6)

论运动战向游击战的战略转变和敌后抗日

根据地的开辟.....缪楚黄(45)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杨奎松(60)

论项英对皖南新四军北移方针的态度.....童志强(90)

关于彭德怀致邓小平的信.....谢武申(102)

工农武装割据的序曲.....黄慰慈(112)

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游民问题与党的策略.....郑春苗(131)

老洋人起义.....陈传海(152)

清末立宪运动史研究述评.....侯宜杰(159)

建国以来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述评.....靳良永(193)

《天演论》探微.....郑永福 田海林(215)

清末苏州商会与捐税抗争.....唐文权 林植霖(227)

从“海丰血案”看封建势力对民族

资本主义工业的摧残.....蔡鸿源 孙必有 徐梁伯(251)

张绍曾与“滦州兵谏”.....杜春和(259)

旅英所见英国国家档案局藏有关中国近代史的档案

.....刘存宽 徐曰彪(280)

• 书刊评介 •

评吴相湘著《孙逸仙先生传》.....赵矢元(295)

介绍一批湖广铁路借款新资料.....撰 侃(306)

• 读史札记 •

邱国轩团的隶属关系及其被秋收起义部队

收编过程.....龙正才(312)

对许继慎两次任职问题的考辨.....徐修宜(316)

开除冯自由党籍时间的订正.....戴均良(318)

开展河北的游击战争

(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一日)

徐 向 前

河北在持久抗战上的意义

平汉津浦两大南北平行的铁路干线，纵贯于河北境内，日寇向中国的腹地侵略，这两条干线，已成为转运兵力的重要枢纽；为牵制日寇的前进，截断日寇的运输，分散日寇的兵力，所以开展河北的游击战争，是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这是第一。

第二，河北有三千万以上广大人口，日寇想实现其以华制华的阴谋，与应付独霸东亚的大战，是需要大批的中国人民来替他做牛马当炮灰的。最近日寇在河北所占各县，成立伪组织维持会、清乡军，并强迫群众成立护路队等，便是明显的表现，我们为着持久抗战，增强抗战力量，削弱日寇的力量，开展游击战争，配合主力军作战，也必须要把河北的三千万以上的同胞，推动到抗战的阵线中来。

第三，河北是华北物产丰富之区，不仅有大量的粮食产量和其他物产，而且有居中国首位的棉花生产，棉花是火药制造的原料，也是日寇国内特别发达的轻工业——纺织工业的原料，所以开展河北的游击战争，在打击日寇的资源掠夺上也是很重要的。

总之，开展河北游击战争，在中国的持久抗战，与取得抗战胜利上，是有其伟大意义的。河北游击战争的开展，可以破坏日寇在平汉津浦两大铁路干线的交通运输，使日寇的资源掠夺，物资补充，兵力转移，陷于麻痹的状态，可以使日寇利用中国人打中国人的阴谋，归于泡影；而且在扩大抗日的阵地，充实抗日力

• 此文是徐向前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撰写的一篇文章，未公开发表过。

量，即在供给抗日的资源上，对全国的抗战有极大的帮助。』

建立平原地进行游击战争的观念

河北的地形，除西北两面的一部分是山地外，其余都是广漠无垠的平原地，如果单从战术上的眼光看来，游击队在平原上的活动，自然没有象山地那样多的地形上的便利，相反的敌人的机械化的兵种或骑兵，倒有较便利的条件了。因此或许有人会怀疑到平原地开展游击战争，也许会不可能。有些人说游击队既无山的依托与隐蔽，自然地形上的帮助是很少的，而人的两条腿又那能跑过机器的汽车或坦克车呢？不错，在平原上进行游击战争，上面这些困难确实是存在着的，但这仅仅只是困难，不能因此作出平原地无法进行游击战争的结论。否则必然会否认华北广大平原地区的游击战争，这种观念，对于开展河北的持久抗战，扩大抗战的阵地，与充实抗战的人力物力，是非常有害的。

创造平原地的“人山”

游击队活动的依托，一面是地形上的便利条件，如山地森林等等；另一面是与广大人民的结合，但游击队要自己能巩固和发展，并进行机敏的灵活的动作，其主要条件是取得广大人民的拥护与帮助，过去宝贵的经验，都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周恩来同志说：“军队与游击队是鱼，而人民是水。”这个比喻是最正确不过的。河北是人口较稠密的区域，假如我们能在河北平原地上，把广大的人民推动到抗日战线上来，把广大的人民造成游击的人山，我想不管什么样的山，也没有这样的山好。

人民的力量是最伟大的力量，也只有这伟大无比的活动的人民的力量，是日寇无法战胜的力量。我们要在平原地开展游击战争，就必须把广大的人民造成人山，但是如何能把散漫的人民造成团结的人山呢？那就必须在人民中进行广泛的深入的教育说服，宣传组织等的艰苦工作，提高人民的民族意识与政治觉悟，

使人民本身的利益，与抗日的利益，联系起来，使每个人民认识要想自己不受日本的蹂躏，那就只有为中华民族的自卫战争而牺牲一切，为民族的生存而奋斗到底，这是每个人民的天职，是每个人民应担负起的责任。凡是苟安贪生，把个人利益看得比国家民族利益高的观念，是极端有害的，殊不知“皮之不存，毛将安附？”整个民族亡了，个人还有什么？

其次从日寇的力量上说，也可清楚地看到日寇虽然占据平汉津浦铁路的北段及沿铁路的重要城市，但因为战区的日益扩大，战线的不断延长，与各地人民抗战武装的继续兴起，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日寇的兵力是异常不够分配，这是日寇最痛苦的地方，所以日寇只能抓着交通线上要点的要点，而不能分兵深入各地，就是日寇在巩固沿铁路的要点上，也已使用了不少兵力，减弱了对我们进攻的力量，这一时期平汉线上的交通，常遭我游击队之破坏与威胁，已使日本东奔西突，南增北援，大有疲于奔命之苦了。

日寇因感到兵力的不敷分配，交通的难于维持，于是在到达之处，便收买汉奸，成立伪组织维持会与清乡军、光复军等，企图利用汉奸的政权以实现其以华制华的毒计，而补其兵力之不足之弱点，同时大杀大烧，镇压日益开展的人民抗日运动，并用阴谋诡计，挑拨离间，分裂抗日军队与人民的团结，但这些并没有收到好大的效果，并且在中国的民族觉悟中与抗战团结之下，受到了严重的打击，日寇的奸掠烧杀激起中国人民仇恨的心理。

游击队的经常胜利，不仅保全了千万人的生命财产，而且还予日寇以大大小小的打击，更提高了人民抗战胜利信心，兴奋了人民参加游击战争的勇气。

无论从主观上客观上说来，造成了人山的条件是具备的。但是必须同样地指出，空喊是不成的，必须我们有进行这种工作的决心，必须一切的游击队有良好的纪律，具有抗日的高度积极性，在一切行动中，真正表现自己是为民族利益而斗争，真正站在保护人民的利益上，才能造成人山，这是政治上最主要工作。

几个战术上和组织上的问题

甲、河北人户稠密，这些一望无际连绵不断的村庄就是游击队最好的辗转活动的依托，这些稠密的村庄，可以隐蔽行动，可以秘密企图，又可作为埋伏袭击敌人的据点。但是村庄只能作为袭击的掩护，而不是待敌人来打时，作为固守的据点。

乙、平原地是利于骑兵活动的，最好组织一些骑兵游击队的支队。因为骑兵的运动性大，可以迅速转移地区，不易受敌人包围，可以作远距离的向敌人防御疏忽与薄弱之点，实施突然的袭击，使敌人难于防备，疲于奔命。但骑兵支队的兵力，不应过大，过大即有笨重之累，且难于隐蔽自己的行动与防空。

丙、一般游击队的组成，都同样不宜过大，尤其对敌人机械化兵种的袭击与飞机的扰乱下，必须以机敏的迅速的动作隐蔽起来，与迅速转移另一地区，兵力过大是不适宜于这种战术要求的。但是许多游击队中必须有基本游击队的组织，在基干游击队的周围，繁殖与组成或分遣若干的小游击队，这些小游击队的作用是在基干队的周围，进行侦察、警戒；袭击敌人，迷惑敌人，牵制敌人，截断敌人交通，配合基干部队作战。

丁、游击队的主力应位于可以四面周转的地区。在情况有利下，可以迅速突击敌人，在情况不利时也可以迅速转移别一地区，所以游击队的根据地，或休整的场所，应该多取几个，并且要相互间有很好的联络。

戊、脚踏车在平原地上，运动是比较迅速的，利用作为交通的工具是最好的。而且还可以组成小的××车游击小组，向远距离的行程上活动。尤其对于施行突然游击，炸毁敌人疏于防卫的木工建筑物与仓库等，是有相当作用的。在这种场合，并不在于兵力的相当大，而是在于乘敌不备的无法防卫的突然动作。

加紧河北的地区的工作开展河北游击战争

现在日寇在各地的奸掳烧杀所造成的种种惨状，迫使河北同

胞不能不起来与日寇作自卫的战争。推动这些旧的武装，使他们走上抗日的道路，是异常紧迫的工作。但这个工作，不仅各方面在精神上物质上人力上予他们以帮助，而且必须在政治上提高其民族意识与政治觉悟，调解相互间的争端，加强抗日的团结，逐渐消灭其宗派门户之见，逐渐破除其落后迷信的思想，使其在抗日的过程中锻炼成为国防的力量，是目前在河北开展游击战争的任务之一。

特别是河北地区民间枪枝很多，民性强悍，最近各地武装组织，猛烈地扩大，都是我们在河北开展游击战争的有利条件，但必须认明这些武装部队多系自发的无组织与无纪律的。一般存在着下面的弱点：

第一，游击战争的组织还没有普遍，过去大家对这一问题的注意，亦极不够。

第二，现有的武装部队，多半带有各种封建性（如红枪会、天门会等等）与多少带有土匪性，这些武装组织的相互间，还存在着一些宗派门户的成见，私人利害观念，尚未克服，因之动作极不一致，配合也不密切。甚至在日寇汉奸的阴谋挑拨下，互相猜忌，互相争夺，引起了一些蠢笨的行为，减低了抗战的力量，客观上替日寇起了以华制华的作用。

第三，有一部分在日寇的威胁利诱下，走上了伪组织伪军的道路，但这只是个别上层分子的私欲行为，而广大的下层群众是反对这种贩卖国家民族的无耻行动的。

只要我们有正确的政策，有坚苦卓绝的工作精神，把我们的工作重心放在争取每一个中国人，每一个武装部队，到抗战道路上头的立场上。只要我们有决心去组织与进行河北的艰苦的游击战争，我们便一定能够创造广大的“人山”，创造出许多平原游击战争的经验与英勇奋斗的光荣篇幅，最后地配合主力，葬送日本帝国主义，收复我们的失地。

开展河北的游击战争，把游击战争的火焰在河北各地广泛地燃烧起来！

抗日战争时期的苏中根据地

管 文 蔚

苏中根据地是抗战时全国十九块主要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之一。它的范围：东濒黄海，南临长江，西抵运河，北至盐城、宝应以南，共十八个县，面积二万三千平方公里，人口据一九四一年统计，约八百余万人。该地区处于平原水网地带，盛产盐、粮、棉等战略物资，与上海、南京仅一江之隔，直接威胁日伪心脏地带——沪宁铁路沿线，因此为敌、顽、我必争之地。

本文对苏中根据地的发展过程作一个概要的回顾。

一、苏中抗日民主根据地开辟前的情况

苏中抗日民主根据地是在一九三九年才着手开辟的。苏中这个概念则是一九四一年华中局会议上确定下来的，以前统称苏北。

在一九三八年以前，苏中的情况用刘少奇的话来概括：“丧失了时机”。因为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上海失陷后，直到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之前，日军由于兵力不足，只注意正面战场，在苏中只占领少数沿江城镇，如南通、如皋、扬州等地。驻守在那里的日军不足一千人，伪军为数也不多。国民党政府则惊惶失措、弃地而逃，江苏省政府从镇江逃到淮阴，以后又逃到兴化，从沪宁线上溃退到苏北的散兵游勇，散处各地，一套便衣就可以换一条枪，许多流氓海匪就乘机拉起队伍，各树旗帜，他们扰民有余，抗敌不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情绪则是十分高涨，许多爱国青年和从国民党监狱中出来的共产党员到处寻找党的

领导，却总是很难找到。当时苏中敌后基本上处于“真空”状态。

党中央对发展苏北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十分关心。一九三八年五月四日，中央指示东南分局书记项英：“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再分一部分渡江进入江北地区。”五月十四日，中央致电江苏省委，指出：“省委目前中心任务是加强对于乡村游击战争的领导，创立许多游击根据地。”五月二十二日，中央指示得更明确：“在津浦路以东、陇海路以南、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内，即应建立一个能独立领导工作的工委，其主要任务是发展游击战争。江苏省委即应派一些得力干部去，并应从上海有计划地动员学生、工人、积极分子、革命分子、党员到那里去工作。”九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方针，并撤销长江局，成立中原局。一九三九年二月下旬，周恩来到达皖南军部，确定新四军的战略方针是“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

但是，当时由于长江局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影响和项英等认为，平原水网地区如苏北、淮北等地，一马平川，没有深山老林，不好开展游击战争，更不好建立抗日根据地，即使建立了，也无法长期坚持，而不切实际地考虑天目山计划、黄山计划，不愿向苏北敌后平原发展。新四军四支队高敬亭部也认为苏北平原水网地区难以开展游击战争，而留恋皖西山区。以致中央上述那些严肃而明确的指示未能得到及时的有力的贯彻，丧失了良好时机。这些都是对当时形势的认识不足所致。

在上海的中共江苏省委在抗战开始时，对开展游击战争和建立抗日根据地的问题，思想上还不够明确，因此也没有及时派遣大批干部和工人到大江南北发展游击战争。一直迟至一九三八年八月才陆续派少数同志，如唐绍宗（守愚）、陈伟达、吴佐成等到江北组成江北特委，在南通、如皋、海门、启东等地区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他们在国民党部队和地方群众中建立和发展党的组

织，并在沿海一带，组织了少数渔、盐民的自卫武装。但是，由于当时形势已相对稳定，国民党已逐渐恢复他们在苏北的统治，重新建立了各级政府，恢复了秩序，收编了大部分自发的武装游击队，并严格限制和禁止人民群众的抗日活动，因此江北特委就很难大力发动群众，独立组织武装开展游击战争了。

这样，苏中敌后发展游击战争及建立根据地的最好时机，就白白被放过了。正如刘少奇所指出的那样，抗战开始时华中党“没有把主要的注意力、工作的中心放在组织和发展敌后广大乡村中的抗日游击战争上，而放在那些不久就要失守的城市中非武装的群众斗争上……没有在敌后去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而仅仅以帮助国民党军队抗战为满足。”（《刘少奇选集》（上卷）第268——269页）

陈毅、粟裕等不顾项英阻挠，在苏南敌后取得了较大发展。陈毅在一九四四年说过：“我们进入苏南只赶上了第三批，第一批戴笠成立了忠义救国军五万多人，第二批顾祝同成立了江南挺进军一万余人，我们去搞剩下的，并于三八年七月到三九年四月搞起了一万四千人。”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如果当年没有江南指挥部领导的这一万四千人，没有陈、粟亲自建立的茅山根据地，也就不可能有后来苏中地区的大发展，就更要丧失时机了。所以说，苏中抗日民主根据地是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发展。陈毅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以后，才腾出手来进行向苏北敌后发展的工作。时间已经进入一九三九年了。

二、苏中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开辟

一九三九年的抗战形势，已经进入相持阶段。敌人已经停止正面进攻，对国民党采取诱降政策，把重点转向华北敌后，对八路军加紧进行军事扫荡。国民党也把政策重点从对外转向对内，制定了一套反动的“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具体政策。

至于苏中情况：日军对国民党部队采取“和平共处”政策，除占领必要交通线外，互不侵犯。韩德勤就任苏鲁战区副总司令之后，利用合法地位，着手整顿苏北各地的杂牌武装，先后整编为十个保安旅，连同正规部队，号称十万人，实际不足七万；苏北的地方实力派李明扬、李长江依靠桂系后台，担任鲁苏皖游击总指挥部正副指挥，设总部于泰州，组成十一个纵队，号称三万人，实际不足二万；还有财政部直辖的税警总团陈泰运部，约三千人，设总部于泰州东北之秦潼镇。

为了开辟苏中，陈毅进行了如下一系列工作：在军事方面。一九三九年一月，陈毅派我率领挺进纵队梅嘉生、韦永义两个支队一千余人过江，同泰州二李达成谅解，将江都县的嘶马、大桥、吴家桥作为我挺纵活动地区。两李当时有自己的意图，认为可以借新四军的声威抵制韩德勤的兼并排挤，同时觉得我们人数不多，又非新四军正规部队，可以随时吞并。同年十一月，陈毅又派出陶勇、卢胜率领二支队四团一部分渡江北上，与挺纵四团梅嘉生部合编为苏皖支队，活动于扬州以西的仪征、天长、六合地区。十一月底又派叶飞率老六团大部渡江与挺纵合编，仍称新四军挺进纵队，管文蔚、叶飞分任正副司令。至此，新四军已有两支主力部队到达苏北，形成足跨长江两岸，随时可以发展苏北的有利态势。项英始则反对六团北渡，继而又迫于国民党第三战区顾祝同的压力，再三建议中央军委调回四、六两团，均为中央和中原局书记胡服（刘少奇）及陈毅所拒绝。

在政治方面。陈毅考虑由于丧失了时机，要开辟苏北地区已不会象华北那样顺利。除了与日寇斗争外，还必然要与积极反共的韩德勤决一雌雄。陈毅分析了敌、顽、友、我四方面的情况，根据中央指示，提出“击敌、联李、孤韩”的发展苏北的策略方针。这是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在苏北的具体运用，充分利用韩德勤和两李之间的矛盾，揭露韩德勤假抗日真反共的面目，争取地方实力派的同情和中立。于是，陈毅在我军和韩德勤正面交锋之

前，在苏北就把主要精力放在争取中间力量的工作上，特别是放在做好两李的争取工作上。因为李明扬资格老、部队多、后台硬，在苏北国民党部队中有一定号召力，是苏北地方实力派的首领。

为了做好两李的工作，陈毅从一九三九年夏到一九四〇年春，三进泰州，轻车简从，单刀赴会，亲自会晤两李。其中尤以第二次会谈融洽，两李待以上宾之礼，召集部队请四将军讲话（四将军是指陈毅、管文蔚、惠浴宇、陈同生，为避免韩德勤耳目，才用此双关语贴出标语，以示欢迎，不指明番号，也不指明人名，笼统称四将军），把蒋介石、韩德勤的反共密件告诉我们，并商定时机，帮助我东进。李明扬也到吴家桥作了回访，并慰劳我军一万元。当两李同韩的矛盾比较激烈时，我们还暗中援助两李子弹二万发。后来两李在江南有子弹十万发无法过江，我们就帮助运输过江，送交两李，所以一九四〇年五月之前，挺纵与两李部队还能相安无事。陈毅还通过李明扬、陆小波（江苏省省会镇江的商会会长）的关系，与苏北著名耆绅韩国钧（紫石）取得联系，互赠手书对联。韩国钧曾两次担任江苏省长，在国民党军官中有许多门生故旧，在苏北上中层士绅中有很大影响。做好韩国钧的统战工作，可以争取苏北中上层士绅地主的支持和靠拢我们。陈毅还请当时担任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委员的黄逸峰（地下党员）去做税警总团陈泰运的工作。请江苏省政府战地党政委员会指导员季方（进步人士）去做通如海启地区国民党杂牌部队的工作。总之，除韩的嫡系八十九军、独六旅外，对所有国民党部队，我们都广泛地开展了统一战线工作。

当然，工作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国民党顽固派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我八路军粉碎之后，又把反共目标转移到比较弱小的新四军方面来。一九四〇年三月十九日，韩德勤乘罗炳辉率五支队主力在津浦路西作战的机会，以八个团的兵力进犯我淮南半塔

集，郭述申、周骏鸣、张劲夫、方毅等坚守半塔集。双方激战旬日。罗炳辉率主力东援，叶飞带挺纵部分主力也相继赶到，敌仓皇逃遁。

根据新的斗争形势，中央军委于一九四〇年三月二十九日指出蒋介石的“磨擦中心将移至华中”，“华中之皖东、淮北、苏北成为顽方必争之地”。毛泽东也明确指示：整个苏北、皖东、淮北为我必争之地，华中是我最重要的生命线。中原局书记胡服向中央建议：最有大发展希望的地区是苏北，是我军战略突击方向，应集中大力发展。这与陈毅的想法不谋而合。

这就是当时的华中形势。苏北也正是处在“暴风雨的前夜”。

郭村战斗就是暴风雨前夜的一首序曲。

一九四〇年五月中旬日军大举扫荡我扬中，以及扬中对面之吴家桥。挺纵部队激战一天，杀伤敌人颇多，为了防止敌人报复，部队北移到扬泰公路以北之郭村。郭村是两李防区，距泰州二十余里。我们将它作为暂时借用休整之地。

此时，一方面由于敌伪顽乘机挑拨两李与我之关系，特别是韩德勤，利用两李对我军在苏北的发展的疑惧心理，又打又拉，表示要与两李“捐弃前嫌，重修旧好，共同反共”，挑动两李向我进攻；另一方面也由于我领导干部中对苏北情况不甚了解，对争取两李的方针认识不尽一致，遂发生了两李同挺纵的大规模的武装冲突——郭村战斗。

六月下旬，两李在韩德勤的挑唆离间下，竟向我们下了最后通牒，限三天内退出郭村。我们一面派政治部副主任陈同生前去泰州向李说明苦衷，请求宽限时日，一面急电中原局和江南指挥部请示。陈毅连发三电，要我们尽量避免冲突，退出郭村，免中顽伪诡计，必要时可以退回江南，卷土重来。我们考虑再三，如退出郭村，群众要受很大损失，还是固守待援为好，可以一举解决两李部队。六月二十七日，韩德勤下达作战命令：“着李总指挥所部及张星炳、何克谦、张少华各部队，并泰县常备旅迅速将江

都、泰县境内各匪军一鼓而歼灭之。”独立六旅也奉命随时准备出动。六月二十八日，李长江纠合十三个团的兵力对郭村四面包围，轮番进攻。我们挺纵与远道驰援来的苏皖支队，以两个多团的兵力，在叶飞的具体指挥下，打退了李长江的十多次进攻。七月一日，在李部的共产党员陈玉生、王澄、姚力等各率所部（一个团带一个营）在驻地起义，我们遂转守为攻，击溃李部三个团，俘虏支队长以下七百余人，直逼泰州城下。顽韩命两李坚守泰州，独立六旅立即向泰州增援。

陈毅七月三日起到郭村，下令停止进攻泰州。一面对部队进行热情慰问和鼓励，一面批评我们领导干部：“战役和战术上的胜利不等于战略上的胜利”。我领会陈毅这一批评的主要精神，是说郭村战斗在战役上、在局部上是胜利的，而且是很大的胜利，但在战略上、在全局上却是一着败棋，因为打击了中间力量，违反了统一战线政策和“联李”方针。以后陈毅亲自出面，做了许多善后工作，才得以弥补裂痕，重修旧好。如停止进攻泰州，归还全部被俘人员和缴获枪支，交还郭村、塘头等原两李防地，甚至还将我军在江北的吴家桥、大桥等老根据地移交两李，以换取两李的中立。这确是伟大的战略远见。这种魄力，是罕见的。

我曾在一九四二年华中局扩大会议上汇报苏中工作时，对郭村战斗作了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当时如果韩德勤增派主力支援，如果苏皖支队不能及时赶到，这两个“如果”只要有一个实现，我们就很危险了！无怪乎陈毅当年化装单人日夜兼程赶到新老洲准备北渡夹江，而被阻于江中的时候，听到郭村方向的炮声，十分焦急，曾经写过两首《吊管、叶》的诗，时隔久远，原诗已经忘却，现在只记得其中一首用了杜牧《题乌江亭》的典：“兵家胜败事不期，包羞忍辱是男儿。江东子弟多豪杰，卷土重来未可期。”陈毅摘取了这诗的后两句的意思。四十五年前，陈毅已经给我们开过追悼会了。想不到陈老总竟先我而去。伤哉！

郭村战斗仅是开辟苏北的一段小波折。这段波折却使我终身难忘。郭村战斗就其积极方面来说，确实锻炼和提高了部队战斗力，鼓舞了广大群众的革命情绪，对苏北的中间势力也显示了我新四军的军威，引起了较大的震动。但是由于对党的统一战线策略理解不深，掌握不好，险些铸成大错，若不是陈毅善后处理得当，非把两李打到韩德勤那边去不可，那样就促成了韩、李的大联合，那就不可能有以后黄桥决战的胜利了。正如中央军委一九四〇年十一月批转陈毅《关于苏北统战工作经过与主要经验》中所说：团以上干部“要深切研究统战策略，破除其狭隘而不开展，顾小利而忘大利，称英雄而少办法的观点”。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这段批语，虽不是针对郭村战斗个别负责同志而言，实有普遍教育意义，我一直铭记不忘，直到今天仍有其借鉴作用。

在组织方面。除了上述江苏省委派遣的江北特委外，陈毅还在一九三九年春，派出惠浴宇等组成苏北工委。同年秋，东南局派韦一平到苏北工作，改苏北工委为苏北特委，韦、惠分任正副书记。苏北工委（后改特委）组成后，在泰兴、泰县、高邮、扬中、江都等地活动，积极发展党员，在挺纵驻区举办训练班，训练骨干分子，并发展各种抗日群众组织。一九三九年十月，江苏省委又派陈国权、韩念龙到崇明县重建党的组织，组成中共崇明县临时工作委员会，将当地自发的抗日群众武装，统一组成崇明县抗日民众自卫总队部。

在军事、政治、组织等方面做了一系列工作以后，一九四〇年七月八日，陈毅建议并经中央批准，粟裕率江南指挥部及老二团、新六团等主力渡江，与挺纵、苏支会合。江南指挥部改为苏北指挥部，部队整编为三个纵队，九个团，约七千余人。通过整编，统一了指挥，协调了行动，部队面貌为之一新。

粟裕说的好，在江南主力北渡之前，顽我斗争以争夺中间力量为中心，此后，即转入正面交锋阶段了。既然同韩德勤的正面交锋不可避免，重要的问题在于选择好决战战场，也就是说，要

迅速建立根据地，创造较好的群众条件，决战时才会有坚强的后盾。当时陈、粟等考虑过三种方案：一是北进兴化，直捣韩德勤老巢；二是扼守原地，以逸待劳（中原局意见）；三是东进黄桥。三者各有利弊：北进兴化，违反自卫原则，而且大军深入水网地区是兵家所忌；扼守原地，地区狭窄，粮食给养大成问题，向外发展，必然要与两李发生冲突，且韩德勤大军来攻，必然要拖两李下水，影响全力对韩；只有东进黄桥，以黄桥为根据地，才利于同韩决战，因黄桥地区有我党的工作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影响，群众基础较好，且盘踞该地的保安第四旅何克谦部，一贯勾结敌伪，敲榨勒索，久失人心。所以东进黄桥，不仅政治上有理，军事上有利，而且是与韩德勤决战的理想战场；不足之处则是黄桥南濒长江，万一决战失败，危险性极大。

陈毅出发之前，在连以上干部大会上说：我们这次东进，只能胜利，不能失败。我们是破釜沉舟，背水一战，决不西返。吴家桥已交给两李，望同志们下定决心去争取胜利。

七月二十九日，我军东进，通过两李防区，两李伪装不知。我军继而攻占黄桥、蒋垛、古溪、加力等地，全歼何克谦保四旅，并攻克靖江东北之孤山、西来镇等敌伪据点。我军声威大震。

进驻黄桥之后，先成立黄桥军民联合办事处，以陈同生为主任。不久又成立通如靖泰临时行政委员会，我负责行政工作。九月，成立了苏北区党委，以陈毅、陈丕显为正副书记。撤销了江北、苏北两个特委。我们在黄桥及其周围地区大刀阔斧地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为决战作准备。

陈毅当时抓了三件大事：一是大搞统一战线工作。这是关键性的工作。如果统战工作做不好，则一旦战争发生，危险性极大，所以他必须亲自抓。我、朱克靖、惠浴宇等也协助做这一工作。朱当时任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团团长。二是大规模发动群众，大力把党的基础搞好，加快发展了一批积极分子入党，并将过“左”